

明清帝后璽印

郭福祥 著



中国出版集团

责任编辑 韦尔立
封面设计 音 之



ISBN 7-80173-079-8



9 787801 730794 >

ISBN 7-80173-079-8

G·013 定价: 78.00 元

明清帝后玺印

朱家潘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清帝后玺印 / 郭福祥著. —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2.8

ISBN 7-80173-079-8

I. 明… II. 郭… III. 皇室—古印(考古)—研究—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 K877.64 ②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4825 号

明清帝后玺印

著 者 郭福祥
责任编辑 韦尔立
封面设计 音 之
印制监印 姚惠民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
印 刷
开 本 787 × 960 16 开
15.25 印张 26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书 号 ISBN 7-80173-079-8/G·013
定 价 7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com

序

朱家潘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中，明清帝后宝玺虽然属于一个比较小的藏品门类，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反映明清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物证，在相关的研究领域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几年前，我们曾编辑出版一部《明清帝后宝玺》图录，郭福祥同志即主要撰稿人之一。现在，他又将自己十几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编为此书，并请我作序。这部书稿的写作情况我是比较了解的，故愿为之。

关于明清帝后宝玺的大致情况，我在《明清帝后宝玺》弁言中已经述及，在此不复赘，这里只想谈谈检阅书稿之后的一点感想。就本书内容而言，作者摆脱了过去以文物论文物的传统模式，所论并非局限于宝玺本身，而是从实物材料入手，结合相关文献，研究和探讨帝后宝玺的源流、制作、使用、制度，以及历史背景、文化内涵等一系列问题。全书不仅从整体上对明清帝后宝玺进行了诠释，而且还能窥见宝玺的拥有者——皇帝及后妃们的思想、情趣、性格等等，读者可以从中获得相关的知识，受到一定的启发，既是作者研究工作的结果，又可为有关研究者、爱好者进一步研究提供资料。就本书使用的材料而言，主要有两种：一是故宫所藏的宝玺实物，二是故宫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实物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这是由本书的研究对象决定的。如何研究实物，采用怎样的研究方式，无疑牵涉到档案的重要性问题。这也是我过去经常强调的，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也有体验。研究清代历史文物，档案是最直接、最可靠的史料，可以使我们的研究脱离过去研究中出现的揣测之词的影响，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如果没有档案，宫里的有些东西恐怕就成了无本之木，许多问题也就没有办法说得清楚。重视档案，将实物与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这一点对文物研究，尤其是对故宫文物的研究至关重要。通览全书，可以看出作者无论在具体问题的考述上，还是在有关材料的使用上，都下了一番功夫。

最后，我还想就宫史研究和文物研究谈谈自己的想法。有人认为，宫史范围的史料都是些无关大局的琐事，可以不去研究，那是错误的。事实上，宫史研究是历史研

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完全可以印证和解决某些重大问题，澄清其他专史中存在的某些误解。而研究宫史恰恰应从细小处着眼，以小问题为对象，多作一些有深度的个案研究。一个个小的方面都搞清楚了，有了必要的知识准备和框架，大的方面也就自然容易弄明白。不解决小问题，一心想解决关键，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文物研究必须与文献结合，与历史结合，才能充分展示出其丰富的内涵。归根结底，与文献材料一样，文物也只不过是历史研究的材料，文物研究最终是要解决历史问题，为历史研究提供佐证。用物说话，以物证史，这是文物研究的一个方向。不管是深是浅，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努力了，总会有所收获。希望本书作者以此为开端，朝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

2002年1月于紫禁城

序

徐启宪

中国玺印，是中国灿烂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玺印，特别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帝后宝玺，对于研究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诸方面，都有极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至今，研究帝后宝玺方面的成果微乎其微。1996年，由故宫博物院编辑，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帝后宝玺》，可谓第一部研究帝后印玺的专著。其中郭福祥先生是主要撰稿人。郭福祥先生又经数年精心研究，撰写了《明清帝后玺印》一书，长达十五万字，配图百余幅，即将出版问世，希望我写篇序言，谈谈对明清帝后宝玺的认识。说实话，由于自己的学识浅薄，对明清帝后印玺又缺乏研究，实在说不出一二三。但盛情难却，好在在编辑《明清帝后宝玺》大型图册时，与郭先生一起共事，有些感想写出来，或许有补于对明清帝后宝玺的了解和认识，就作为此书出版的序言吧。

帝后宝玺，若从秦始皇“乘舆六玺”开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朝因之，宝玺数目多少不一，但遗存者却寥寥无几。唯其明清两朝的帝后宝玺有较多的遗存，特别是清代帝后宝玺较完整地保存下来，除少数帝后宝玺因战乱散失民间和海外，绝大部分仍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因工作关系，我曾涉猎过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帝后宝玺，不论从它的收藏数量、种类、印质、印文、刻制，到它的用途、刻法乃至装潢，无不体现了明清帝后宝玺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深厚的历史沉积和艺术传统都藏于方寸之间，大到明清重要历史典制，小到帝后一言一行，无不从方寸的玺印中找到。我们说研究明清帝后宝玺，对研究明清两朝的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艺术史、篆刻史、宫廷史及民俗史都有着极为丰富的史料价值，此言决不是夸大其词。从郭福祥先生问世的著作中，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

文物研究与档案、文献相结合，是历史研究、文化艺术研究和文物研究的新阶段。以往的历史文化艺术研究，多从文献角度出发，其结论往往缺乏历史的证据，说服力不强；而文物研究，往往就文物论文物，没有与档案、文献相结合，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找不到文物的历史沉积和文化内涵，帝后宝玺也是如此。帝后宝玺，它的产生

与发展变化，历代宝玺制度及演变，宝玺的使用及管理，帝后闲章的产生和发展，帝后闲章的使用及特点，帝后宝玺所反映的历史面貌、文化内涵、思想情趣等等，不与有关档案、文献材料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是找不出历史的真实答案和深邃的艺术结论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着丰富的明清档案，有关帝后宝玺的记录极为丰富。郭福祥先生利用极便利的地理条件，在浩如烟海的档案中搜索有关帝后宝玺的历史资料，结合有关历史文献，有资料，有观点，系统地论述了明清帝后宝玺的历史概况及思想文化内涵，撰写出有学术价值的专著。这是一部资料性、学术性、可读性很强的书。

明清帝后宝玺，包括有微信作用的玺印和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闲章，除反映明清两代政治、经济、文化外，对明清帝后思想和情趣以及个人的性格的研究，具有特殊的作用。以清为例，以往历代封建王朝，都把自己的皇权归为天命，代天行事，传之万代。乾隆皇帝以他的经世致用的哲学观点来观察历代皇权的兴衰，认识到没有一个王朝“恒享昊命而不变者”，多者二三百，少者十几年几十年即被推翻，被一个新的王朝所代替，皇权的生存长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在整理和核定宫中宝玺时，确定清朝宝玺为二十五方，取义于《周易》大衍天数之意，他说大清王朝能传之二十五代就是奢望了，也可以说是天之“赐世赐年”，它反映了乾隆皇帝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和冲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思想，作为一代盛世的皇帝，乾隆识变的思想就很了不起。再如康熙皇帝刻制“敬天勤民”之宝，反映了康熙皇帝民为贵的思想。他看到了历代王朝的兴亡都与民有关，民安，则国兴，民反，则国亡，民可载舟，也可覆舟，民乃国之根本。康熙皇帝把“敬天勤民”放在日理万机首位，视其为巩固皇权的根本所在，他一生中把精力放在国家统一、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安定民心上，国家日益强盛，百姓安居稳定，开创了“康乾盛世”的新局面。雍正、乾隆两朝继承之，三朝都把“敬天勤民”宝放在宫中重要位置，说明了“康乾盛世”与“敬天勤民”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再如，康熙的“戒之在得”、“万机余暇”、“九有一心”；雍正皇帝的“为君难”、“朝乾夕惕”、“建中于民”；乾隆皇帝的“犹日孜孜”、“自强不息”、“谨起居慎出令”、“所宝为贤”等等，结合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他们对玺印的解释，不难看出身居高位的皇帝们的思想和情绪，也不难了解皇帝们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思想和情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郭福祥先生的大作中，用较多的笔墨描述了宝玺中反映出的明清帝王们的思想和情趣，对我们了解几百年前的历史是非常有趣的。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封建社会的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朕即国家，一言九

鼎，因此，皇帝的一言一行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具有微信作用的皇帝宝玺是最高权力的标志，就是皇帝的闲章，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微信作用，这在明清历史上不是少见的。如清道光于秘密建储的朱谕中，亲笔御书“立皇四子奕訢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立为亲王”，立储朱谕和建储匣封条上都盖有道光皇帝的“继德堂”小玺，此小玺在这里就起到了皇帝最高法律效力的微信作用。由此可知，从清雍正元年确定秘密建储制后，每位皇帝遗诏及建储匣上都要有皇帝的玺印，以微信于天下。清末，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改“祺祥”年号为“同治”，两太后垂帘听政，凡同治皇帝的上谕明旨，都要上起用“御赏”章，下谕用“同道堂”章，而这两方小玺是咸丰皇帝的闲章，临终前赠与慈安和儿子载淳，载淳年幼，由生母叶赫那拉氏暂管，这两颗闲章，在“辛酉政变”和同治皇帝亲政前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如果我们认真地探索皇帝闲章的具体用途，就会发现许多历史事件和皇帝的密谕，都与皇帝的闲章有密切关系。

在郭福祥先生的大作问世之前，说出我在编辑《明清帝后宝玺》大型图册中的一点感想，对于读者阅读郭先生的著作有所帮助的话，就算达到我的心愿了，也就没有辜负郭先生令我写这个序言的愿望。幸甚。

2002年2月于紫禁城

前言

在故宫博物院近百万件文物藏品中，有些门类是属于特藏性质的。所谓特藏，即是指收藏单位拥有某类文物或资料的全部或绝大部分，其他收藏者很难望其项背，要进行相关的研究，必须首先占有这部分资料才行，从而形成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收藏。故宫的明清帝后宝玺就是如此。

故宫博物院现藏明清帝后宝玺近五千件，占已知全部帝后宝玺度藏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藏于深宫之中的皇家秘宝。

—

说起帝后宝玺，并非每个人都能理解得了，因为“宝玺”二字不是一个常用的语汇。所谓“宝玺”，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印章，只不过这些印章的主人不是普普通通的人，而是高居于封建王朝权力金字塔尖上的皇帝及其后妃们，至少也是封王封侯的皇亲国戚。“玺”“宝”二字用于皇帝印章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汉人卫宏和蔡邕的《汉官旧仪》和《独断》都记载说秦以前的玺印尊卑共之，秦以后才出现差别。“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所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从此，只有天子之印称玺成为制度，以后历代相沿。至唐代皇帝天子的玺印制度为之一变，改玺为宝。《旧唐书·职官志二》云：“天后恶玺字，改为宝，其授命、传国符八玺文并改雕宝字。”唐中宗即位，又改雕成玺字，玄宗即位，再改雕成宝字，以后皇帝玺印则“宝”“玺”共用。这样看来，“宝玺”专指皇帝印章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为是帝后御用之物，有时也称为“御玺”。

前代帝后宝玺的存世量很少，故宫所藏也仅限于明清两代。作为内府御用之物，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归纳起来，其价值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宝玺的玺文并不是随便拿来一句话就用的，而是要经过严格的挑选，由皇帝亲自审定批准。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夫天子宸章，择言镌玺，以示自警，正也。”这些玺文或出自被封建帝王奉为天条的儒家经典，或出自历代诗文中的名篇佳句，或出自皇帝自己所作的诗文，都是有感而发的，真实地反映了皇帝们的情趣和喜好，与皇帝当时的思想和行为有着密切关系。比如诸多文献都记载说明朝皇帝多喜好道教方术，迷恋丹砂以求长生不老，但都只限于文字，并无确切的实物证明，而故宫博物院

却藏有大量明代皇帝的道教印，与文献记载正相吻合，证明文献所载不误。将文献和这些实物结合起来，使几百年后的我们仍真切地感受到明代宫中丹汞横流法事不断的盛况。又如在许多人的眼中，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以其不懈的努力，创造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最后盛世，他们自己的生活看起来也安宁富足，站在权利的塔尖上指点乾坤，生杀予夺，好不威风。但有谁会知道作为“天下第一人”，他们内心深处的苦闷与惶遽呢？但我们却通过“戒之在得”、“为君难”、“犹日孜孜”、“自强不息”等宝玺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抚物思人，对为君之难会有更深一步的理解。可以说，这些宝玺是难得的研究明清帝后个人思想和生活的实物资料。

其次，自秦汉以后，历朝都制订了自己的官印制度，加之社会风尚的变迁，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点的印章制度。由于明清帝后宝玺牵涉到宝制、用印制度、公文发布等问题，因此，他们显然是研究宫廷典章制度的重要的实物见证。如清承明制的问题，在明清宝玺中就有明确体现。据康熙朝《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康熙以前共制作二十九方御宝，除宝文重复者外共有二十六种，其中“奉天法祖亲贤爱民”、“敕正万邦之宝”、“制取六师之宝”为清代新增，而将“大明受命之宝”改为“大清受命之宝”外，其余二十二种宝文与明朝御宝完全相同，标注的各宝使用情况也与明朝御宝基本一致，清承明制的迹象十分明显。再如清代二十五宝藏于交泰殿中，为宫内宥密之地，且置于宝盞内，层层施锁，其使用的具体程序不甚详明。如果将御宝的藏地及其所处的位置、保存的状况、机构设置综合起来，再参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请宝用的绿头牌实物以及相关文献，便可比较清晰地理清用宝的相关细节。这些对我们认识明清典章制度的嬗变、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

再次，明清帝后宝玺质地多样，制作精良，是研究明清雕刻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明代皇帝宝玺的印钮多螭虎等瑞兽，线条明快洗练，施刀简洁，重大势而不经意细部，古朴中不失神韵。而清代宝玺之钮则题材多样，刻画细腻，细部雕施一丝不苟，须毛毕现。对比之下，时代特点非常明显。龙钮是帝后宝玺常用的钮式，就清代交龙钮而言，顺治以前龙头瘦而有神，龙身粗壮，高高拱起成系绶孔，须眉鳞目纹饰雕刻很深，粗犷中不失细腻。康熙、雍正时期则龙身变得细弱无鳞，与龙头粗细相当，刻意表现背部的参差不齐的龙鳍，龙身不再拱起，但两龙身体盘绕之状甚明，龙头上昂与背部等高，神态威猛张扬，绶孔变小。乾隆及以后钮之轮廓变成了长方体，两龙共用一身，盘绕之状不甚明显，龙头方正，龙鳞被平行交叉的直线切割成菱形，装饰意味浓厚。如果把不同时期的交龙钮排列在一起，其形态演变发展的序列清晰可见，成为断代的重要依据。清代早期是寿山石雕刻的繁荣期，但留存下来的作品却不多，帝后宝玺上

的钮雕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获得这一时期寿山石雕刻的取材、装饰特点、艺术风格等一系列情况。同时，档案记载这些钮大部分出自当时供职于宫中的南方的牙、木等匠人，可知当时的寿山石雕刻与同时期的牙雕、木雕有很深的渊源，这些可对其他种类的雕刻艺术以及寿山石雕刻与其他种类雕刻艺术的关系的研究提供借鉴和依据。

另外，清代帝后宝玺中的满文也是探索满文字体演变的绝好实物证据。早在清入关前，就有一种用于木刻、石刻或铜刻的满文书体，可能是受到版面的限制，故书写时通常将满文字尾后伸的长脚直伸而书，以减少所占之面积，从而形成一种特殊书体，由于这种直立式的书体后多用之于玺印，故有人将其命名为“玺书体”。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天命、天聪时期的无圈点满文“金国汗之宝”、“天命金国汗之宝”以及乾隆钦定二十五宝中的“皇帝奉天之宝”、盛京十宝中的“奉天法祖亲贤爱民”、“救命之宝”、碧玉“皇帝之宝”中的满文部分使用的都是这种书体。此外，满文篆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由初创到渐次成熟乃至完善的过程，这在清代的宝玺中是有所表现的。二十五宝中的青玉满文“皇帝之宝”、盛京十宝中的檀香木满文“皇帝之宝”、金质满文“奉天之宝”和“天子之宝”使用的都是满文篆体，但还不是太成熟，如“汗”字收尾已有了篆字棱角的味道，而起笔则保留了满洲本字的特点，尤其是上面的圈点明显是本字的写法，“宝”字也是一样，可以说是满文本、篆字体相结合的产物。这种不成熟的篆体出现于清太宗时期，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乾隆十三年创制规范化的篆体。规范化的满文篆体吸收汉篆的结体特点和笔法，从起笔到收尾横平竖直，棱角分明，端庄规矩，结构严谨，被广泛施用于帝后宝玺和各级官印之上。要获得全面完整的满文字体演变发展的材料，恐怕只有到现存的清代帝后宝玺及各级官印中去寻找了。

当然，帝后宝玺的价值还远不止这些，只要占有大量的材料，进行深入的发掘，就会发现更多有用的东西，受到更多的启迪。

二

对明清帝后宝玺的研究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由于历史的原因，皇帝宝玺一直深藏于皇宫大内，世人难以目睹。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较简略，皇帝常用的国宝，仅在明清官修的会典、实录、宫史中论述，而大量的皇帝御用闲章，即使是官修正史也不述及，仅散见于皇宫收藏的古代书画和典籍及皇帝诗词御笔中，但终是凤毛麟角。清宫虽将清历代皇帝宝玺编辑成《宝藪》，但仅见印谱而无印形，为系统研究带来许多困难。

1925年2月6日至7月30日的《京报副刊》连续刊载了魏建功先生的《琐碎的记

载清故宫》一文，其中“交泰殿宝谱”、“传国玺及其他古玺”、“玺衍记”诸节对故宫藏二十五宝、伪传国玺等情况作了介绍，这可能是比较早的记述明清帝后宝玺的著作。此后，1934年出版的312期至348期《故宫周刊》上又连续刊载了《清乾隆印玺志》一文，是根据院藏《宝藪》所载的宝玺整理而成，计1092方，包括宝玺质地的统计数字、玺文的具体内容等。此后几十年则很少见到有关的成果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故宫博物院的各项工作走向正轨，帝后宝玺的研究才出现复苏的迹象。1979年，刚刚复刊不久的《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刊登了徐启宪先生的《“御赏”、“同道堂”章与慈禧篡权》一文，此文利用档案及其他文献对两方印章的来龙去脉、使用及慈禧利用同治帝年幼代为掌管“同道堂”玺之便达到干预朝政的史实进行了详尽考证，发前人之未覆，开启了一条文物和文献结合进而考证历史的帝后宝玺研究的新路径。此文直到现在仍是帝后宝玺研究的最好成果之一。1985年12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故宫博物院藏宝录》，其中“帝后印章”一节由叶其峰先生撰写，包括概说、清皇帝之宝、珍妃之印三部分，对宫中所藏的帝后印章状况进行了介绍，并详细考订了“皇帝之宝”、“珍妃之印”二玺。帝后宝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通观几十年来的研究状况，尽管许多专家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印章艺术和宫廷历史方面也涉及到明清帝后宝玺，介绍宝玺文物，但系统深入研究仍不明显，关键仍是资料甚少，实物难见。

为了开拓印章艺术发展史的研究，特别是帝后宝玺制度的研究，故宫博物院同仁从馆藏的数千方帝后宝玺中遴选出数百方具有代表性的宝玺，编辑成《明清帝后宝玺》大型图录，1996年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此书由故宫博物院著名学者朱家潘先生任顾问，徐启宪先生和李文善先生任主编。全书分明、清两个单元，每一个单元又分国宝、御书钐用诸玺、后妃宝玺、皇帝升附庙号谥号册宝及附录诸部分。由于故宫收藏的明清两代帝后宝玺数量和内容不同，故两单元诸部分简繁不一，明代部分从简，清代部分从繁，清晰反映出明清帝后宝玺收藏的状况。每一部分前都有相关的研究文章，第一次对明清帝后宝玺制度进行了全面考辨，尤其是朱家潘先生的弁言，考论精当，如行云流水，读之如饮稠酢，是公认的帝后宝玺研究的美文。此书将明清帝后宝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受到海内外的重视。

此前对明清帝后宝玺研究的状况大致如此。

三

我对帝后宝玺的研究开始于十几年前。那是198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故宫博物院，经过一段实习后，被分配到了当时的保管部宫廷组，专门从

事帝后宝玺、钟表、药具药材、外国文物的保管和研究。尽管在大学时对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所学又是文物博物馆专业，但在校时对这些小的门类却很少涉及，加之当时故宫对这些文物的研究还很薄弱，可资借鉴的东西很少，面对这些陌生的面孔，真是有些无所适从，不知从何搞起。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发现与其它几类文物相比，帝后宝玺本身提供给我们信息还多一些，循此发掘，是可以搞出一些东西来的，于是，便把帝后宝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列入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之中。从那时开始，我对帝后宝玺的研究大致经过了几个阶段。

首先是对文物的熟悉过程。利用进库整理文物的机会，对院藏帝后宝玺的数量、朝代分布情况、内容进行记录，有不明了的，再根据文物本身提供的线索查阅相关文献，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小问题，撰写出《没入清宫的陈孚恩私印》、《乾隆与清代印制》、《乾隆推崇文彭治印》、《清代帝后印玺的制作》、《往来酬唱君臣情》等文章，发表在《紫禁城》上，这样经过了两三年，基本上弄清了院藏帝后宝玺的状况，对帝后宝玺的研究也稍入门径。很幸运的是，1993年紫禁城出版社将《明清帝后宝玺》大型图录列入了出版计划，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在朱家潘先生和徐启宪先生等老专家指导下，我又对明清帝后宝玺制度进行了研究，撰写出国宝、御书铃用诸玺部分的分论。在此书编辑过程中，与老先生们遴选文物、商定体例，他们渊博的学识，毫无保留的传授，都成为我研究的坚强后盾。此书1996年出版，所收文物之多之全，为前所未有，为明清帝后宝玺的研究提供了翔实而准确的资料。通过这一阶段的研究和学习，对明清帝后宝玺制度算是有了一个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认识。《明清帝后宝玺》出版后，有些问题仍有言犹未尽之感，有些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利用，尤其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相关档案是明清帝后宝玺具体个案研究极为珍贵的资料，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基于这一想法，我又到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了相关档案，获得了大量有关制作帝后宝玺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对典型作品进行分析，以每个皇帝为段限，分别撰写文章，基本解决了制作、使用、背景探讨、文化内涵解析等问题，对明清帝后宝玺的认识更进了一步。这样下来，我的有关明清帝后宝玺的研究基本上形成了序列。

本书就是在以上研究基础上重新整合的结果，大致反映了我对明清帝后宝玺的基本认识，其体例仍沿袭《明清帝后宝玺》，尽可能地搜集有关史料，综合归纳，对有关问题展开论述。在本书中似乎还应加入有关帝后宝玺辨伪的章节，但我认为辨伪工作是在扎扎实实的研究基础上才能完成的，只有掌握大量资料，明晰收藏状况，既见真又见伪，才能准确无误地做出判断。否则，连基本的资料还未掌握便奢谈辨伪，最终还是枉然。我只希望本书提供的资料能对帝后宝玺的辨伪有所帮助，于愿足矣！

在这本小书付梓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著名学者朱家潘先生和徐启宪先生，有关的研究工作一直是在他们的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二老并慨然应允为本书作序，提携后学，令人感动。在这里我还要感谢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将此项选题列入故宫博物院课题，给予必要的支持，使研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马晓旋先生、林京先生拍摄了大部分图片，清东陵研究室主任徐广源先生对书稿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韦尔立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由于作者的学识有限，书中难免有讹错之处，真诚地希望专家学者给予批评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源远流长	2
第一节 玺印的起源与名称变化	2
第二节 历代宝制及其演变	6
第三节 明以前皇帝的闲章	14
第四节 明以前后妃宝印概述	17
第二章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22
第一节 关于传国玺之名	22
第二节 传国玺的历史	26
第三节 现存传国玺辨识	31
第三章 明代国宝	36
第一节 明代国宝的制作与演变	36
第二节 明代的掌宝机构	37
第三节 明代国宝的使用	44
第四节 国宝、皇权旁落与宦官专权	48
第四章 明代皇帝的闲章	52
第一节 明代皇帝闲章的制作	52
第二节 明代皇帝闲章的种类	53
第三节 与明帝闲章相关的几个问题	59
第四节 明帝闲章的使用	60
第五节 明帝闲章文化意义解析	63
第五章 明代后妃宝印	66

第六章 清代国宝	72
第一节 清军人关前之国宝	72
第二节 承明制之早期国宝	77
第三节 乾隆与清代国宝制度	81
第四节 盛京十宝	84
第五节 晚清国宝	86
第六节 国宝之保存	86
第七节 国宝之使用	89
第七章 清代皇帝的闲章	94
第一节 入关前诸帝及顺治帝的闲章	94
第二节 清帝闲章的种类	96
第三节 清帝闲章的质地与钮制	98
第四节 清帝闲章的制作、保存和使用	102
第五节 闲章中所表现的清帝思想与情趣	107
第八章 康熙宝玺	110
第一节 康熙宝玺的著录情况	110
第二节 康熙宝玺的制作与现存实物	112
第三节 康熙宝玺的使用组合	114
第四节 康熙宝玺与康熙思想及生活	115
第九章 雍正宝玺	126
第一节 雍正宝玺的制作	126
第二节 雍正宝玺与寿山石雕刻艺术	132